



【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马克思主义： 批判与辩护

Post-Marxism: Criticism and Defence

■周 凡 主编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股新的颇有争议的国外社会、政治思潮。尤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面世以来，引起了持续的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本书全面展示了国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反思、探讨与争鸣，以期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国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问题域及其争论点提供参考。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马克思主义：

批判与辩护

Post-Marxism:
Criticism and Defence

■周 凡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周凡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

(后经典文丛)

ISBN 978-7-80211-492-0

I. 后…

II. 周…

III. 马克思主义—文集

IV. 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4053 号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010) 66509360 66130345 (编辑部)

(010) 6656963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m a i 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80×980 毫米 1/16

字 数：400 千字

印 张：23. 5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 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后经典文丛》序言

中文中的“经典”指的是传统的和具有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比如：中国的医学工作者把《本草纲目》视作中医经典；儒学学者把孔子的《论语》（当然也包括一些后人的研究著作）视为儒学经典；《古兰经》和《圣经》分别被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人视为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则被马克思主义者或其研究者视为经典。经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过去一定时期内具有权威性，后来渐渐失去了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一种是始终都具有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这就出现了中文中“古典”与“经典”的区分。前者被称为经典中的古典。古典的不一定是古代的，同样的，经典的也不一定就是现代的。意义全在今人的态度而确定。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它是古代的，而是因为它是过去的经典。中国的《论语》出自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古代的，但是，它对于儒学研究者而言，则依然是经典。

不过，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经典的，在时间上都是指过去发生的，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因此，英文中对这两者不加区分也是有道理的。英文中的“classic”不仅有“古典”的含义，而且有“经典”的涵义。更重要地，这个词在英文解释中还有“有名的、著名的；传统的和典范的”等等涵义。经典的这一层涵义虽然在中文词典中尚没有来得及添加，但是，中文的日常语言中却已经非常普遍地流行起来了。比如人们常说的“经典歌曲”，“经典评语”，“经典手势”，“经典对白”，“经典语句”，“经典案例”，“经典笑话”，“经典短信”，“经典假唱”，等等。经典概念的这些用法，或许有的是在调侃的意义上，而有的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但是，它们取得都是“传统”和“典范”的含义。经典概念一旦突破了典籍和著作的范围，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对象的形容词，其表达的空间便被无限地扩大了。

我们这里使用的经典概念显然不是指具有权威性的典籍和著作，而是特指某些经典理论和对于这些经典理论的经典理解。在这样的经典的意义，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理论形态。

将近 100 年来，尤其是近 50 多年来，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战以后，尤其是近 30 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使得这些一向被认为是具有绝对权威地位的经典理论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后经典理论。

本丛书就是在大量的此类文献中选取的一小部分，它们虽然不能与经典理论相提并论，但是毕竟涉及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变化，代表了一些新的思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阅读经典之余，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许会增长一些知识；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阅读这些文献，则或许对于其研究工作会有所帮助。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自从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希望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能够有所贡献。

李惠斌

2006 年 9 月 26 日

目
录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代序论）

——兼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 周 凡（1）

英国的新修正主义 [英] 拉尔夫·密里班德（26）

后马克思主义？ [英] 诺曼·杰拉斯（49）

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

..... [英] 欧内斯托·拉克劳 尚塔尔·莫菲（102）

空洞的非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实实在在的回应

..... [英] 诺曼·杰拉斯（136）

绝对的意志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批判

..... [英] 迈克尔·拉斯廷（164）

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 [英] 尼科斯·穆泽利斯（187）

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理论探讨的“四个过错”

..... [英] 格雷戈尔·麦克伦南（205）

面对新自由主义政体：后马克思主义信奉民粹主义和实用政治

..... [澳] 鲍里斯·弗兰克尔（230）

论后马克思主义、民主与阶级 [美] 乔纳森·迪斯金（274）

后马克思主义、民主与激进政治的未来	[英] 西蒙·托米 (281)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	[美] 阿伦·亨特 (299)
为什么葛兰西九泉之下难以安息？ ——从拉克劳与莫菲那里拯救葛兰西	[英] 奈杰尔·格里维斯 (311)
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鸦片？	[美] 丹尼尔·T. 麦吉 (325)
后马克思主义想像中的本质主义与经济：重新打开缝合	[美] 乔纳森·迪斯金 布莱尔·桑德勒 (346)
编译后记	(368)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

——兼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

(代序论)

周 凡

按莱斯利·里普森 (Leslie Lipson) 的说法, 最极端的政治变革就是革命。“一个集团在同一宪法体系的框架内、并按宪法规定的和被广泛接受的程序, 从另一个集团手里取得权力时, 不是革命。当宪法和政府都被重建时, 革命就发生了, 除宪政的革命以外, 社会也经历自上而下的变革, 革命本身的特性也变得更加彻底, 通常会出现巨大的动荡和无序。”^①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政治, 这表现在它不仅把政治国家理解为暴力统治的机器, 并且执意要以血腥的暴力彻底摧毁这种政治暴力的最后形态, 而更为重要的是, 它把激进革命的最终目标确定为一种无对抗的透明社会——这种激进政治的终极目的恰恰在于取消政治本身。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写道: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 公共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② 后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运作某种特定的系统方式来全面修改这种激进主义的政治的观念, 之所以是全面修改, 是因为它既要改其方式, 又要改其目的; 之所以说它是“修改”, 是因为, 后马克思主义不愿望与激进政治决绝, 它要以重构的形式将“激进精神”保留下来, 但是这种延续下来的激进种子已非原来的激进面目, 它是被阉割的激进, 被驯化的激进, 也许是保守的激进, 抑或像齐泽克所说的, 是反激进主义的激进主义。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展示拉克劳与莫菲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的哲学改造来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概念的性质与特征。

①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 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4。

一、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

马克思向来以普罗米修斯自喻，他想盗来天火将资本世界烧个精光。我们通常说卢卡奇早年曾经过救世乌托邦主义阶段，其实，马克思的革命弥赛亚主义情结比卢卡奇更浓重。每次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都不由自由地想起小时背的一句诗：“我渴望地下的烈火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天火当然是没有的，所以马克思只能借助于“地下的烈火”。大抵是1843年，马克思终于发现了“地下的烈火”——无产阶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决意摧毁现存的秩序”，并且有能力“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由一个普遍的阶级来实现人类彻底的、全面的解放，这无疑是颠倒乾坤、气吞山河、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恢宏之举。斯特龙伯格指出，青年马克思所以有这样涤荡寰宇、气吞万里如虎的大气度，是由很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除了他年轻气盛、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之外，还由于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浪漫主义结构表现为他的造反观念、普罗米修斯不惧天神的精神、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以及对商人市侩的敌意”。^①

斯特龙伯格的解释肯定是不充分的，因为他太偏重于从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来说明马克思的宏大革命政治的根源。马克思之所以对“部分的纯粹政治的革命”不屑一顾，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地下的烈火”受到压迫不是部分的压迫，而是全面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是某种特殊的苦难，而是普遍的苦难；“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不公，而是一般的不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不是对人性的某种疏离，而是人自身的“完全丧失”。既然无产阶级身上不止一条锁链，而是无数条锁链层层封锁而形成的“彻底的锁链”，那么，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就不能只打开一把锁链或一些锁链，而是必须将所有的锁链彻底砸碎。人的全面异化的观点导致马克思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各部分看作是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总体，总体的异化只能通过对异化的总体扬弃才能达到，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念，它来自黑格尔关于精神的异化学说。正因为无产阶级经受了普遍的苦难，所以它才具有普遍的性质，马克思显然把资本主义加之于无产阶级身上的种种痛苦看作是黑格尔式的“理念”走向绝对“大

^① 罗兰·斯特龙伯格：《现代西方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全”的异化环节。在黑格尔那里，总体内部的丰富的多样性不过是同一精神本原在异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这意味着具体的局部性要素并没有声称实在性的资格，只有当特殊性达到了具体的普遍性，它才成为真实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一观念对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的理论的影响既深刻又长久，它并没有因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失去作用。

浸润于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和全面解放的总体性话语之中的是马克思的启蒙主义信念。在对理性、科学、社会进步、历史的线性演进、人性的统一性的信奉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孔德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他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可以把握的连续进步的上升过程——它由低级的、简单的阶段向高级的、复杂的阶段演化——他才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理性完全展开、欲望与道德秩序完全和谐的人间天堂，他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会有任何具有支配和宰制性质的政治权力。一般来说，后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再接受马克思所抱有的这种现代性观念，即便是像哈贝马斯这样极力捍卫现代性遗产的人，也不满于马克思基于劳动及劳动阶级概念之上的那种狭隘的现代性。就像阿伦特通过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来“肢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样，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行为概念来拓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们所做的工作的隐含的共同意义无非是认为劳动（或生产）概念构成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那些对现代性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后现代主义者（比如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波德里亚、德里达、福柯等等）则径直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政治观念斥责为一种宏大叙事或元叙事。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批判资本逻辑所蕴含及其伴生的现代性，但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仍然没有超出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围，马克思的政治观念内在地包含着现代性政治的固有局限性——一元的权力概念（自由主义认为权力发源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阶级结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这一观念的现实结果便是对趋向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的关注与倡导。差异政治、欲望政治、身体政治、族群认同政治、性政治、边缘政治、文化政治等等，都是后现代的微观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①

^① 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仅仅局限于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之中，而是使一度神秘而庄严的政治以日常化的面目混迹于人类普通生活的各个角落。权力不仅异质化了，而且也“去中心化”了。反叛在学校、家庭、文化机构、医院、消费和娱乐场所、疯人院以及监狱等多种层面展开，政治反抗的主体也不再锚定在某种特选的“普遍主体”身上，学生、妇女、少数民族成员、同性恋者、文职人员、病人、囚犯、教师、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工人、失业者等等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史蒂文·塞德曼对微观政治的性质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他写道：“如果权力在社会领域中四处弥散，如果权力已经被编织进了日常生活这张无形的大网，那么，社会冲突和反抗就不可能集中于某一处。政治反抗运动就不可能被归于诸如反政府主义、反资本主义或反父权制的旗帜之下。社会反抗也必然是复杂多样的；反抗的实践也一定是局部（地域性的）、分散的，并遵循其特定的社会领域（如监狱、学校、性）所特有的社会逻辑。”^①

在对总体的权力理论的拒斥以及对微观政治的诉求上，拉克劳和莫非同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即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是一致的。拉克劳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中就有意识地避免从资本积累引发的经济危机的视角来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试图以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分析策略将政治理解为去总体化的多元要素的连接与凝聚过程，这与赖希关于法西斯主义对人的心理领域的征服、德勒兹与加塔利将法西斯看作是对主体欲望的控制具有潜在的相通之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克劳和莫菲更加自觉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前提，并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和概念工具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政治。他们认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已经趋于终结一样，普适性的宏大政治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像的最后基础”。^②一方面，经典的左派政治分析形式在后现代境遇之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政治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少数民族的、民族的及性征上少数的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体制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发生的种

① 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②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2.

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大到更加宽广的范围。”^① 这些“新的积极现象”的不断涌现催迫着新左派理论家以一种新的理论构架内重建激进政治的话语空间。所以，我们看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这部最负盛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明显表现出“双层结构”：对传统激进政治的理论基础的解构和对后现代语境下新型激进政治的重新建构。

二、由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

在一定意义上，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仅仅是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一种粗略的视觉化的表象性描述。导致此一政治空间外观“变形”的根本性东西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质疑、修正与抛弃。正是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坚信当代政治对抗运动已不再围绕阶级来组织和展开，所以他们才致力于把政治斗争的关注点从“生产场所”转移到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似乎可以说，所有类型的微观政治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一种强劲消解。

像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拉克劳与莫菲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界定为阶级政治。对于他们的这种界定，我们目前还难以提出过硬的反对意见。因为，不管我们怎样费尽心力使马克思表现出一种温和的面貌，却总是无法抹杀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终其一生一直信奉阶级斗争的学说。《共产党宣言》正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表明了马克思坚定的阶级斗争观念：“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52年马克思在写给约·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谦逊地承认了他自己对于阶级斗争学说所添加的三项新内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而马克思最宏大的著作《资本论》的最后一章也以“阶级”为论题。当然，在这尚未写完的简短一章里，晚年马克思似乎变得没有年轻时那样坚决。他承认：“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47页。

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①然而，当马克思提出“是什么形成了阶级”这个问题并试图回答的时候，文稿却中断了。

马克思的这一中断引起了几十年的争论，并激发了无数的政治想像！从这一中断处，似乎可以演绎出种种不同的“下文”。比较正统的想法是，如果马克思继续写下去，他也不会提出一个与事实上他已使用了几十年的阶级概念相抵牾的阶级定义。但这不过是众多想法的一种而已！丹尼尔·贝尔对着“这一中断”发呆良久，从马克思所说的“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这句话中，他受益多多。他感觉出马克思晚年可能想修改他原先的一想过于激进的观点，因为，《资本论》第三卷在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上已表现出与《资本论》第一卷的差异，基于此，贝尔提出了所谓马克思的“两大图式”说。贝尔本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的兴起与壮大之上的。当然，还会有更为偏激的推想：马克思意识到他对阶级概念的使用存在着太多太多的问题，必须要来一个根本性的重构！但马克思的性格和脾气又阻止他在基本观点上尖锐而明确地反对对自己，于是马克思就故意来了一个欲言又止的“中断”：马克思刚刚开启他的思索，却又突然打住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于把马克思本人理解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始作俑者。比如，陈乐民和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就认为：

其实马克思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激烈的行动，赞成暴力革命，这个方面得到恩格斯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具有非凡的分析能力，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增长，在他那里越来越明显。而正是由于这个能力，使他在一些问题上与恩格斯有些分歧，这些分歧不是挑明了的。他越来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感兴趣，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越来越深入地分析，而不是直接与之进行斗争。比如，1857年至1858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时，恩格斯在准备以军事武装战胜普鲁士，他甚至开始以身作则，进行体育锻炼，重新开始练剑等等，而马克思却完全沉浸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分析中。由此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还是朋友。恩格斯还不断向马克思提供信息资料，可是他自己在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1001页。

习骑马和击剑，准备与普鲁士军队骑马打仗。^①

无论如何，《资本论》末尾的中断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中断、一个发人深思的中断！在马克思以后，大凡致力于研究社会分层或阶级问题的思想家无不面对这一中断而“浮想联翩”。马克斯·韦伯说，在这个中断处，马克思“显然想探讨无产阶级的阶级统一性问题，尽管无产阶级在质的方面是不同的”。^② 韦伯正是从马克思这一“中断处”开始构想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他的《阶级、地位和政党》一文就是试图填补马克思的这一“中断”所造成的这个“空场”。在对阶级的理解上，韦伯明显受惠于马克思，他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人们的市场处境（market situation）是社会分层的基本维度，人们在经济秩序中的位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的有无、多少）是客观的阶级归属的轴心。但是，韦伯不同意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唯一原则，他不仅在阶级、地位与政党概念之间做出了仔细的区分，而且彰显了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性（比如，一个破落的贵族，尽管他客观上丧失对财产权的控制，但他通常并不与穷人认同，而是同富人结伙）。强调“认同感”对于阶级规定的重要性，是韦伯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不过是韦伯的主观认同感的一个不适当的变体，因为，韦伯认为“阶级”与“政党”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秩序”而产生的分层结果，它们是互相关联的，有时是一致的，但并非必然一致。而卢卡奇却把韦伯的这一著名区分给取消掉了，他虽然强烈地意识到了阶级意识的不稳定性和“外源性”，但他却把这种外源性直接等同于政党的灌输和赋予。卢卡奇对韦伯的这一区分的背离，是导致卢卡奇赞同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源所在。可以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卢卡奇抓住了主观认同感，旋即又将它放逐了。在卢卡奇那里，相对于强大的物化意识，阶级意识显得既纯洁又高贵，可悲的是，它无比的脆弱、同时又出奇地稀少！

正如卢卡奇没有听从韦伯的忠告，超越作为职业的学术与作为工作的政治之间的界线而投身革命一样，卢卡奇也没有按照韦伯的范式认真对待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非对应性。韦伯像康德一样处处都力图划一条界线；而卢卡奇则像黑格尔那样，极力把种种界线模糊化或

^① 陈乐民、史傅德：《市民社会·启蒙精神》，载《万象》2006年第8卷第3期第2页。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7页。

取消掉。两人思想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对阶级概念的不同处理方式：韦伯通过区分财产阶级、获利阶级和社会阶级表现出一种关于阶级的多元主义宽松观念；卢卡奇则由于把阶级归属完全等同于阶级意识从而走上了一种严格的阶级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和莫菲对卢卡奇的思想的评价一点都不高，他们更加偏爱将阶级认同复杂化的葛兰西。

20 世纪下半叶孕育而生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韦伯的问题。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不一致表现得更加明显，影响阶级认同的因素远远超出了韦伯当年的“三元”（即经济、社会、法律）互动的狭隘想像。在客观层面上，由于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过程缩短，大量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带来了更多的个体化工作机遇，从而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而风险社会的到来更是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和社会身份的变动性；在主观层面上，人们关注的政治问题转向了过去被认为不重要甚至被忽略的一些问题，比如生态环境、女性权利、同性恋、生活格调等各种不同的新型社会问题，这导致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碎化、个人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的个体主义化，这一切都拉大了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的逻辑连接变得更加困难。

像韦伯一样，拉克劳和莫菲在 1970 年代后期试图对阶级认同问题进行某种超出经济限制的理论“解严”。但他们比韦伯更加激进化。一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韦伯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再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还不够激进”，^① 韦伯之所以还不够激进，是因为他“没有牺牲掉作为阶级这个概念之基础的经济学涵义”。^② 拉克劳和莫菲在思考“什么形成了阶级”这一问题时候，并不像韦伯那样引入其他因素来限制经济因素的独占性，而是企图将经济悬置起来（即将之虚化）。如果说韦伯（以及后韦伯主义者）的理论努力旨在提供“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中所缺少的东西，即对阶级概念的一个清晰明确的讨论”，^③ 那么拉克劳和莫菲则企图通过疏离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经济基础从而将客观的阶级归属化为乌有，如此一来，政治主体统一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于主观层面的认同感的缔造。这是拉克劳和莫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

①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3 页。

②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3 页。

③ 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1 页。

书所达成的主要结论。

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拉克劳和莫菲思想的康德主义影子。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关于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存在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形式的二元区分上。也许正是由于拉克劳和莫菲与韦伯共同的康德主义根源，使得他们都否认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意识层面的阶级认同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之处在于，拉克劳和莫菲在对阶级认同对于阶级归属的影响上更加强调整康德的“形式”原则：在康德那里，“现象”不是由“物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在“物本身”的作用下，通过直观形式和思维的范畴形式建构而生成的；同样，在拉克劳和莫菲这里，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正是拉克劳和莫菲对“形式”原则的建构性的过度信誓才导致他们在1970年代末已超越了韦伯主义的视界，因为韦伯总是在一种修正过的阶级框架内思考问题，而拉克劳和莫菲的一只脚已经踏出了阶级分析的领地：他们宣布，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要素都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拉克劳和莫菲不再谈论“意识形态的接合”（ideological articulation），而是直言及“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何以如此呢？其根本性的原由是：在前一部著作中，拉克劳和莫菲虽然断言了中立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以及这种非阶级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把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主导力量，此时他们依旧坚守葛兰西的信条——只有“基本阶级”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就此而论，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扩大了，但并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性，即是说，拉克劳和莫菲还是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相对自主的界域之内带着链子“跳舞”——这个链子就是与意识形态异质但却宰制着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话语。后一部著作的实质性跃进即在于，拉克劳和莫菲义无反顾地砸碎了这条“锁链”：他们坚决地取消了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区别，这种取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福柯的话话理论的修改，在其关键意含上，它是拉克劳和莫菲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大的范式转换。就像艾伦·伍德所指证的那样，在此，“独立的意识形态（更准确地说，是话话）已经涵盖了整个社会领域，已经不再仅仅是把意识形态从任何社会基础中分离出来的问题；现在，社会本身是由

意识形态或‘话语’所构成”。^①既然一切都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既然一切都是意识形态，那么核心问题就不再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关系，而是意识形态自身的主导权与非主导权的关系。这就好比，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不再称之为“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一样，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要面对一个与之并不完全同质的世界（在认识论里物本身是理性无法最终把握的对象），这就有一个防止理性的潜越问题；而到了实践理性的范围，不再是怕理性过于“纯粹”，而是怕理性不“纯粹”，因此，也就不存在批判理性的“纯粹”问题，这样一来，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也就不很合适了。同样，在拉克劳和莫菲看来，意识形态的“纯粹性”问题已经解决了，因而再谈意识形态的接合反而会造成某种误解，好像还有非意识形态的接合似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拉克劳和莫菲还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将一只脚缓缓地挪出阶级分析之外；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他们异常坚决地把另一只脚也跨了出去。因此，在对阶级概念的消解上，从前者到后者是一种扩展关系，后者将前者的“理论与政治逻辑发挥到极致”^②：前者只是留出一个非阶级意识形态的空隙，而后者则彻底解除了阶级的“武装”；前者仅仅是反对阶级还原论；而后者则是告别阶级政治。从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到宣称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性，拉克劳和莫菲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内在“颠覆”：他们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固有秩序倒置过来，不是阶级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而是意识形态形塑了“阶级”——当然，这种由意识形态所形构的政治群体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它只是一种由主导话语所暂时缝合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认同体而已！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拉克劳和莫菲也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后一章的那一中断处开始的——马克思的问题是：什么形成了阶级？拉克劳和莫菲的回答是：什么也形成不了阶级，因为通过认同而达成的政治统一性根本就不能冠以“阶级”之名：阶级在当代已不再是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范畴。由此，我们才可以真正体认到吉登斯所说的“韦伯还不够激进”并不是虚言一句。韦伯试图重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拉克劳和莫菲则解构并抛弃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当然，后者比前者要“激进”得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格伦斯基把那些尝试着修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理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3.

②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53.